

太原文史资料

主 编

段 克 明

太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太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主 任： 段克明

副主任： 潘怀伟 杨伯予 杨汝侨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任贵成 安晋藩 陈秀蓉（女）

张厚余 李钰川 郭 强 陶占魁

麻克宽 解 华

顾 问： 郝树侯 李 敏 张四本 李以柱

杨子丰 石 岩

目 录

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我在太原的点滴

见闻·····	翟品三	(1)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太原·····	田中峻	(8)
阎锡山悼念抗战阵亡将士的诗文·····	徐崇寿	(20)
民族革命政治实施研究院与杜任之·····	杨汝侨	(26)
回忆先父李服膺·····	李振英	(32)
军调小组在太原·····	赵儒元	(36)
蒋介石莅并视察采访记·····	赵谦受	(42)
阎锡山到南京的前后·····	孟庆华	(50)
一个典型战例·····	李布德	(59)
黄寨火车站阎军一个连投诚始末·····	杨凤岭	(68)
国民党太原市党部组建概况·····	张其昌	(75)
我所知道的太原市三青团·····	黄廷璧	(80)
民族革命同志会太原市分会概况·····	熊实吾 穆 森	(89)
<u>《民众日报》</u> 记事·····	冯育栋	(93)
解放前的太原 <u>《民众晚报》</u> ·····	宋希川	(100)
<u>《平报》</u> ——一个短命的报纸·····	续约斋	(103)
阎锡山佚事——摄阅兵电影·····	崔汉光整理	(106)
太原西北电影公司简介·····	崔汉光整理	(108)
解放前太原戏院电影院概况·····	李茂春 贾宣宗	(113)
民国年间在太原举行的两次大型运动会·····	崔汉光整理	(115)
清朝末年到解放前太原的环境卫生状况·····	段克明	(122)
解放前的太原电力工业·····	曹荣宽	(131)

解放前的太原供水事业·····	张百顺	(140)
解放前的太原晋丰面粉公司·····	杨静刚	(142)
解放前的太原新记面粉厂·····	杨静刚	(150)
太原水泥厂历史概述·····	赵民杰	(156)
太原火柴业的演变·····	张其昌整理	(163)
太原最早的机器造纸业——西北制纸厂·····	张其昌整理	(167)
山西工业协会成立前后·····	徐一揆	(170)
华泰厚服装店更上一层楼·····	杨若愚	(172)
解放前的太原老香村食品店·····	田忠祥 夏林	(175)
解放前太原制毒见闻·····	胡敬斋	(181)
居住太原的满族概况·····	吴据德	(186)
张振铃传略·····	李方杰	(191)

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我在 太原的点滴见闻

翟 品 三

以1936年12月20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举行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契机，蒋介石被迫放弃了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表示不再“围剿”陕甘宁边区，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国共第二次合作铺平了道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突然炮轰宛平城芦沟桥，遭到我宋哲元二十九军冯治安师吉星文团的爱国官兵的坚决抵抗，从而开始了全国全面抗日战争。国共第二次合作，并肩抗战，遂由言论逐步转为行动。

“七·七”事变发生时，我在山西省政府财政厅任秘书，现在就我在太原的点滴见闻记述如下：

一、八路军挺进山西，引起 群众的极大震动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节节进逼和我国军民抗战怒潮的澎湃涌起，蒋介石不得不在庐山召开谈话会，商讨时局。共产党派周恩来副主席、秦邦宪（博古）、林伯渠等为代表团于7月15日赴庐山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谈判，后又由朱德总司令和

邓小平代表工农红军于3月14日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解决两党合作抗战的政治、军事问题。

蒋介石于8月22日同意并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的三个师先后从陕北出发，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奔赴抗日前线。

八路军挺进山西，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引起极大震动。这是因为：1935年中央红军经过千辛万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和刘子丹、徐海东部会合，声势大振。陕北和山西仅一河之隔，阎锡山为保持他的山西地盘，遏止红军东向，便接着“公道团”之后，又组织了“防共保卫团”，高唱什么“反共、防共”必须“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论调，还编了“防共歌”，说什么“共产党杀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用以欺骗群众。1936年2月，以彭德怀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的“红军抗日先锋队”突破黄河天险，分三路进入晋西，阎锡山慌了手脚，除调兵堵截、向蒋介石求援，屠杀所谓“匪探”群众外，还编造出许多奇离古怪的鬼话，把红军说成是不与人同的“恶煞神”。

当9月4日一一五师、30日一二〇师、21日一二九师先后由侯马乘火车路经太原时，广大群众抱着奇异的想 法，相率到新南门外火车站（旧地点）去看由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究竟是个什么模样。一见之下，那些“恶煞神”的鬼话不攻自破了，而且由于八路军官兵一致，生气勃勃，纪律严明，对群众说话和气，在群众中留下极其良好的印象。走在街上常常会听到群众交谈：“去年还说人家红军怎样凶恶，怎样可怕，如今亲眼见了，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我嫂嫂的胞姐赵淑玉住在新南门外，她也去火车站看过八路军。有天我到她家串门，她问我说：“八路军怎么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很少有年纪大的？”我说：“八路军是由革命的红军

改编成的。年轻人富有革命思想，愿当红军。”她又问：“那些年轻人怎么心眼那样多，会打什么游击？”我当时还不知道有“群众路线”、“集体智慧”、“诸葛亮会”、“总结经验”这类政治术语，只能说：“人家传授高，是从苏联学来的。”由于她习惯于看旧军队中当官的不仅穿的和当兵的不一样，而且都有卫兵相随，派头十足，便又问：“怎么八路军看不见有官长？”我说：“八路军官兵一致，你看见都是当兵的，其实里边有官长。”

她最后的一句话是：“八路军的精神好，管保人家能打胜仗。”不久，平型关伏击战的捷报便传来太原，群众对八路军旗开得胜，自“七·七”事变以来第七次挫伤日军的锐气，感到无比兴奋和鼓舞！

二、阐扬“合理负担”，促进财政改革

1936年春，红军东渡，在晋西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思想的种子。阎锡山深切感受到改善群众生活的重要性，提出了“合理负担”的口号。同年冬，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矛头指向绥东，于是有晋绥军傅作义收复百灵庙的壮举。在支援绥远战争时，阎锡山按照合理负担的精神曾有过捐款的措施。

“七·七”事变后，共产党于8月25日“洛川会议”上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中第六项是：“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就是改革旧有的财政经济制度，使之合理化、实际化。”在薄一波领导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曾运用阎锡山的政治术语，拟出《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内中第八项是：“切实执行合理负担，逐渐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这实际上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六项在山西的贯彻。

阎锡山对“合理负担”曾提出过三条原则：（一）有财产的

人应当多负担；（二）得利钱的人应当多负担；（三）赚钱多的人应当多负担。1937年2月1日《太原日报》创刊五周年纪念，山西省政府财政厅厅长王平要我代他写一篇关于合理负担的文章送去，曾在“纪念增刊”上载出。我因在省教育学院上学时受过共产党地下党员如李雪峰（原名张青巽）、王书良的思想影响，便以一些比较进步的思想阐扬合理负担的意义。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合理的负担》（三千余字），内分四节：（一）为什么要有负担，从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阐扬国家不能不有财源，因而也就不能不有负担；（二）负担何以要合理，从政治的要旨在求众生的安宁，经济的归宿在谋共利的繁荣，阐扬不合理的负担，不能为政治和经济所见容；（三）怎样负担才合理，从国家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有生命的固然要保护，有生命而又有财产的尤其需要保护，阐扬不能让无财产的人而替有财产的人多负担，就是除保护生命外再加有财产的人的财产负担；（四）合理的负担是什么，根据当时实况，提出：

1、财产捐，视财产的多寡，作捐款的标准。财产多的多捐，财产少的少捐，没有财产的不捐；2、营业捐，依营业的大小，规定应纳的税额，营业大的纳大的税额，营业小的纳小的税额，不是不问大小，一例看待的；3、所得税，以所得的多少，而征收相当的税率，所得的愈多，征收的愈大，是一种累进税制，是最公平最妥善的；4、奢侈税，按租税性质有直接和间接两类。直接税不能转嫁，间接税能以转嫁。奢侈税是间接税，要转嫁也只能转嫁到有力量奢侈的人身上，而转嫁不到一般人身上。

文章的四节是根据阎锡山的三原则加以阐扬，在当时仅仅能起一点宣传的作用。《民族革命十大纲领》于1937年11月7日在临汾（傅作义守太原）才由山西省政府公布执行。后来牺盟会又建议调整合理负担‘免除省内各种杂税’经阎锡山批准，于1938年1月1日一律免除，更把合理负担推向一个新的领域。

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晚会

听周恩来副主席讲演

1937年10月中旬,正在雁门关吃紧,日机不时轰炸太原之际,我的省教育学院同班同学任长治乡村师范教导主任的王中青来太原公干,住在财政厅书房院(我兼教王平儿子读书处)我的宿舍。财政厅后花园建有坚固的防空洞,比较安全。

一天下午,王中青从外边公干回来说:“今晚在国民师范大礼堂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要举行晚会,咱们去观光一番。”我们是中国文学系毕业学生,对进步女作家丁玲自然是久已闻名的。她的处女作《莎菲女士日记》、二十六岁就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吃完晚饭,赶到国师大礼堂时,已黑压压地坐满观众。已坐无虚席,观众还是陆续前来。忽听有人暗中传说:“嘿!周恩来副主席也来了。”我们早就了解周副主席是共产党传奇式的人物,1927年他曾从武汉秘密到南昌组织过“八一”起义。起义军南下广东汕头、潮州受到挫折后,在蒋介石悬赏缉捕中他到了上海,仍旧领导地下工作。1931年冬,他又从上海秘密到了井冈山。当时消息虽被严密封锁,但我们后来也从进步同学的口中听到了。这时又有人介绍说:“周恩来是共产党里最善于讲演的人物。”我们顺着介绍人的指点,看见周副主席站在台下靠北一排座位的旁边,还有一名警卫员。周副主席中等身材,脸庞清瘦,胡须已剃,不是“美髯公”形象,穿的军服和警卫员一样,腰间也扎一条窄皮带,只是从年龄上能以分出差别,和我在太原见过的国民党高级领导人如蒋介石、何应钦、陈

诚的气度，大不相同。

台下的观众，多数不知道来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共产党领导人。那些中青年分片自动结合起来的拉拉队一直在喊：“欢迎丁玲女士唱歌”台上幕后也有人在齐答：“丁玲女士不会唱。”台下这片拉拉队又喊：“丁玲女士不唱行不行？”那片拉拉队也喊：“不行，不行。”台上还是答：“丁玲女士不会唱。”上台台下欢快的充满激情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大礼堂，这在我说来还是第一次见到。

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周副主席的警卫员在台上代丁玲女士唱了一支江西兴国县小调《送郎参军》，唱得婉转动听，引起台下一片掌声。随后丁玲女士出来和观众见面，表示不会唱，很抱歉，并致谢。我过去在刊物上看过她的照片，如今见了她的真面目，胖胖的圆脸，剪发头，大眼睛，微矮的身躯里都是活力。

这时，台上主持晚会的人才正式宣布：请周恩来副主席给我们讲话，台下响起热烈地的掌声。周副主席频频挥手向台下表示致意。周副主席开头的几句话是：“芦沟桥的炮声促进了我们国共两党重行合作，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八路军开进山西来，要和友党友军及山西各界群众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接着又回顾历史，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自甲午战争以来就处心积虑灭亡我国的狂妄野心；讲述了共产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论述了我们进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性和斗争的长期性；最后鼓舞大家说：“只要我们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旷日持久，消耗敌人，再加上苏联的帮助，国际的变化，最后的胜利必然是我们的！”周副主席宏亮的声音，抑扬的语调，激动的表情，卓识有力的论证，紧紧扣着每个人的心弦，随着有节奏的讲词的起落，一阵一阵的掌声不断地轰鸣。我的感受真可说是闻所未闻，大开茅塞。

周副主席讲演后，主持晚会的人一再请台下观众代表讲话。

我鼓动王中青上去讲一讲。他除对周副主席的讲演表示深受教益和感谢外，特别激奋地说：“走！走！我们大家一起到抗日的最前线去；走！走！我们一起到敌人的后方去，发动群众打游击，葬埋日本帝国主义！”他的话音刚落，台下也报以热烈的掌声。

随后丁玲女士出来报幕，先演《放下你的鞭子》，后演《赵一曼》。在演出的过程中，每遇英勇斗争和日军暴虐的场面，观众就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历史事实的发展，充分证明：国共第二次合作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我国反抗帝国主义第一次的伟大胜利，蒋介石也被誉为复兴民族的杰出人物；再看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确定了三大政策，使旧三民主义变为新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势力由踟躇于广东一隅而取得北伐的辉煌胜利，国民党也由在野党一变而为执政党。

今天我国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国共第三次合作，实现“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团结奋斗，振兴中华。愿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一致奋起，共同促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太原

田 中 峻

山西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模范者。二战区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先进地区。作为山西之心脏的太原，是当时全国除延安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这里盛开统一战线鲜花，结出国共合作硕果，太原名城曾有过一段值得骄傲的光荣岁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节节侵略中国，国内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阎锡山为求晋绥王国的存在，就审时度势，标榜进步，设法利用群众运动，在阎的掌握与控制下，1932年至1935年期间，太原先后出现了“中国青年救国团”、“民众监政会”、“建设救国社”、“文山读书会”、“植社”等政治团体，进行活动。阎既要标榜进步，就须延揽一部分左倾进步人士，当时的“青年团”不仅吸收国民党内的反蒋分子，还容纳社会上一些爱国进步人士，该团曾密派张隽轩赴平，把侯外庐、邢西萍、张友渔、温健公、杨绍萱、杜千秋等左倾教授约请到太原，阎锡山为了验证他的“物劳学说”，常邀请这些教授在一起研讨马克思主义，他们则利用阎所标榜的“民主和学术自由”，给“青年团”的干部和青年讲解科学社会主义，并翻译介绍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播下真理的种子。

1934年年初，被共产国际派遣归国策动抗日的杜任之，利用山西公费留德的关系返晋面阎，阎任用杜为太原绥署主任办公室秘书，后在山西大学教书。他曾建议阎吸收外国各种学说和有关知识，杜和周北峰教授发起，经阎同意，成立了中外语文学

会，出刊《中外论坛》杂志，张友渔、徐冰、侯外庐、温健公等革命人士亦参加编译工作，宣传第三国际，介绍“联共”及世界革命动态。杜还组织了“西北剧社”，出版《文艺舞台》，同袁小平、亚马、力群等从事翻译与创作革命文艺作品。中外语文学会曾先后邀请安娜·史沫特莱女士来太原给青年们讲欧州人民阵线，邀请温健公教授给太原学生作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报告，鼓动青年参加抗日和革命。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山西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逐渐从沉睡中觉醒，太原许多中等以上学校都有自发的抗日救国会等组织，那时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党组织，对自发的群众进步组织进行积极领导，并把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各校不乏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学校中民主与革命气氛日益高涨，而以国民师范为主体与核心，从“一二·九”运动爆发之日起，太原学生群起响应，涌向街头，示威呼号，并在国民师范大礼堂开会，成立了太原市中等以上十七院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把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推上新的高潮。

随着青年人政治觉悟的日益提高，进步书店应运而生，公开经销左倾书刊而不受限制，如觉民派报社经销《上海文摘》、《大众生活》、《现世界》等激进报刊，后来，对全国有很大进步影响的生活书店，亦在太原开设分店，大量推销进步书刊，邹韬奋的文章颇受青年欢迎。与此前后，太原还有一个读者书店，专门销售马列主义革命书籍，为进步青年提供精神食粮，革命思潮越过娘子关、越过黄河从东西两面涌入并州，使之渐渐成为一座红太原。

这些可喜事物的出现，无疑是促成日后山西国共合作的有利因素。

1936年2月下旬，红军渡河东征，这是体现中共坚决抗日的战略行动，为全国各阶层人士所支持。阎锡山以红军

东渡直接威胁本身的“存在”，因而采取反动措施，一面调兵遣将，求蒋支援，拦阻堵截红军；一面摧残进步力量，在全省大搞白色恐怖，太原首当其冲，抗日革命活动一度处于低潮。中共为了避免大规模内战的爆发，红军于四、五月间回师陕北，但前来山西协助“剿共”的中央军迟迟不走，使阎锡山产生了“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的忧虑。同时，日本侵略的威胁也使阎深为不安。正当阎陷入“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哪一颗也不能踩破”的困境，中共及时向他伸出争取之手，毛泽东曾托被红军俘虏释放返并的晋绥军团长郭登瀛带函给阎，重申联合抗日、共赴国难的主张，并指出蒋企图借“剿共”之名染指山西，促使阎作出“联共抗日”的决策。老谋深算的阎锡山虽然深知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抉择，但为慎重起见，不对毛泽东的来函作出正面答复，而是派梁化之前往天津邀请与党有一定联系的，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赴晋磋商。朱蕴山来太原后，经过多次会谈，同阎锡山达成了三条协议：一、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反动组织（如“防共保卫团”等）；二、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三、组织一个抗日的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

1936年5月，太原又恢复了民主宽松的政治气候。阎锡山机灵善变，长于看风使舵。当时省内外有不少人纷纷慰问绥东抗日伤员，爱国心情令人激动，使阎觉得抗日洪流无法阻挡。上海红色电影明星陈波儿率团赴绥东慰问抗日伤员，阎手下有些顽固幕僚表示反对，阎就“告诫”他们：“人家一讲抗日，就说是共产党，这样就把第一等的好人推到共产党方面去了，有人到绥东慰问一下伤员，你就说人家是共产党，也会使这些人离开你，这是把四条腿的都当成是老虎了。”又说“冬天穿皮袄，夏天穿汗衫，需要什么就来什么，现在是需要牺牲救国的时候了，”阎正式提出“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以往压制民众抗日的做法有明显改变。这时，“自强救国同志会”（这年春季阎

将太原各政治团体合并而成的统一政治组织)内的中共地下党员及左派青年杜任之、宋劭文、戎子和、张隽轩、张文昂、刘岱峰、刘玉衡等人发起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阎获悉后着梁化之召集他们研究筹备，阎斟酌后定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即牺盟会），成为领导山西抗日救亡的统一政治组织，阎任会长，梁化之为总干事，并容纳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参加领导工作。在决定成立牺盟会的同时，宋劭文根据中共瓦窑堡会议精神，拟定了“八条纲领”，经梁化之同意后，阎予默许，继而披露报端，公诸社会。对此，右派幕僚摇头叹气，左派人士扬眉吐气，整个太原的抗日民主气氛，不仅恢复到红军东征前的状态，而且有了进一步的高涨。正如年初返晋助阎抗日的续范亭先生所说：“山西以一隅之地，进行了守土抗战，收罗了进步青年，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表现了思想自由，允许开设生活书店，我看见山西有了光明，虽然仅仅点出了一支土蜡烛来，光明不大，但我却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学扑灯蛾似的，围着这一点光明，不肯他去了。”他的激情胜似当年参加辛亥革命，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太原的面貌。

7月，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有些进步人提出应乘各校放假机会，组织青年抗日训练班，准备抗战。经阎同意，在国民师范办了“山西青年暑期健身团”，由各校学生和从前解散的各社团成员四、五百人参训，共有七个队，训练内容主要是阎锡山的《物劳学说》及政策主张，也有左派人士讲授革命理论与时事政治，训练两月，大部成为“军政训练班”的干部。而日后由牺盟会掌握控制的“军政训练班”所培养出来的人，则成为牺盟会和新军的干部。

9月，太原广大群众于“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在海子边举行纪念大会，正式宣告牺盟会成立。学生、工人、农夫、商民万余人涌入会场，群情振奋，盛况空前。张文昂主持大会，戎子和发表激昂慷慨的讲话，使阎颇感不悦和不安。《大会告同胞

书》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指责了不抵抗主义的危害，提醒同胞们“和平确已到了绝望的时候，牺牲确已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与其不战而死，何如奋斗求生！”并提出响亮的行动口号：1、我们要打倒汉奸卖国贼；2、武装缉私；3、大家团结起来一致救亡；4、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5、反对任何敌军进攻绥东；6、中华民族解放万岁；7、中华民族万岁！经过这次群情热烈而沸腾的大会，使牺盟会的旗帜高高飘扬于并州上空，并把牺盟——抗日——太原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0月间，中共北方局派从北平出狱的薄一波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同时以帮助阎锡山进行抗日救亡组织工作的名义回山西工作。薄到太原后与阎见面时开门见山提出：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不应受到限制；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的工作，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给予实权和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阎一一表示同意。从此，中共逐步同阎锡山形成了特殊形式的统战关系。牺盟会的领导机构就在此时进行了改组，七名常委中除梁化之外，其余六人都是共产党员。梁化之只不过是牺盟会的名义领导人。十九名执行委员中只有三人不是共产党员。整个山西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权，已完全掌握在共产党人和左派手里。薄一波领导牺盟会工作后，首先加强宣传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同时筹办各种训练班，积极培养抗日革命干部，各项工作顿形活跃，迅速扭转了前段牺盟会活动的沉闷状态。

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噩耗传到太原，引起进步青年和劳动人民的极大哀痛，为了表达对一代革命文豪的悼念，由文艺界亚马、田景福等提议，取得地下党的支持，以太原文学研究会、山西党讯社、最后生路社等单位发起，于10月25日上午10时在山西党讯社大礼堂，隆重举行了有七百多青年学生参加的“太

原市文学青年追悼鲁迅大会，”由亚马主持并致词，侯外庐、裴丽生讲话，阐述鲁迅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及青年文学工作者面临的任 务，使与会青年化悲痛为力量，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次悼念活动为日后太原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把太原文化、青年工作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

11月间，地下党人杜任之从牺盟会调任山西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书记，他利用这个合法的“中央”招牌开展抗日活动，他办了一个《突击》杂志，宣传抗日救亡，同时组织了一个“新生剧院，”先后上演过《放下你的鞭子》、《夜光杯》、《谁杀了婴儿》、《逃到哪里去》等抗日话剧，并请进步人士到剧院给群众教唱抗日歌曲，使太原群众沐浴在抗日气氛中。

12月间，“西安事变”爆发，围绕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太原人们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感受，统治阶级忧虑重重，人民群众拍手叫好。事变一发生，张学良即派代表飞并请阎支持，阎勉强派赵戴文去西安，已赴机场行将起飞，因接到何应钦声讨张、杨通电，阎又改变了主意。当时，于月前来到太原代表中共中央同阎锡山（阎指定亲信梁化之为代表）正在进行秘密统战谈判的红军将领彭雪枫，也向阎表明中共立场，争取阎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出力。在整个事变过程中，阎尚未起到大的妨碍作用。而当时的太原群众则反应强烈，人们怀着对“安内攘外”反动国策的义愤，十分欣赏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杜任之通过秘密渠道获得12月13日的《解放日报》，立即在《突击》上刊发“西安事变”号外，详载“西安事变”经过，并发表以团结御侮，一致对外为内容的文章，大造进步舆论，通过对“西安事变”的介绍与宣传，使太原群众又受到一次深深的抗日爱国教育。

1937年1月，太原成了全国抗日浪潮高涨的城市，有数百名青年学生从北平涌到太原，参加了牺盟会举办的“军政训练班”。